

中央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为出发点、落脚点,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前提,以调结构、促改革为主要途径,处理好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建强网络与畅通末梢、打造枢纽与优化布局的关系,促进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提高物流组织化程度和效率,促进物流与产业融合创新,加强协同衔接和要素保障,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统筹推动物流成本实质性下降,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5%左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实现新突破,货物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铁路货运量、铁路货运周转量占比力争分别提高至11%、23%左右,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保持较快增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国家物流枢纽体系和现代物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物流市场基本形成,现代物流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略支撑显著增强。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一)推进铁路重点领域改革。制定实施铁路货运市场改革方案,促进铁路货运向铁路物流转型,支持铁路货运场站依法依规有序开展物流服务经营活动。改革铁路运输与调度生产组织方式,加强跨路局运输组织协调,创新系列物流产品,大力发展高效稳定、市场化的直达货运班列,探索用好高铁快运功能。完善铁路货运价格灵活调整机制、铁路运输进款清算机制,建立铁路物流服务价格体

有效降低

三、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四)加快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推动大型工商企业提升物流管理水平和社会化程度,科学构建集采购、库存、生产、销售、逆向回收等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快库存周转。加强制造业供应链融合创新,鼓励大型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优化物流流程、共建设施设备、对接信息系统,推广应用综合性供应链解决方案。支持利用工业园区闲置土地、厂房建设物流服务设施。深化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提升商贸供应链协同水平。

(五)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商品市场优化升级,加快零售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商贸流通领域物流设施智能化改造,提高流通组织能力和效率,降低商贸流通领域物流成本。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构建分层分类的城市商业格局,健全城乡商贸流通网络,发展共同配送、仓配一体等集约化模式。深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建设内外贸融合平台,促进内外贸制度规则衔接。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11月26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平息战火、停止杀戮,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经济论坛

□ 金观平

惩防并重打击财务造假

针对财务造假顽疾,中国证监会加强部际协调和央地协同,构建综合惩防体系,开展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专项行动。今年前10个月,共查办相关案件658件,罚没款金额11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开展专项行动,反映出监管部门对财务造假的“零容忍”,正以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严打财务造假者,铲除造假滋生土壤。相关数据也表明,过去一段时期上市公司还存在相当多的造假问题。据此前证监会披露,某企业连续10多年财务造假,虚增营业收入超百亿元,让人瞠目结舌。

人无信不立,市场无信不兴。信息是投资者决策最重要的依据,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上市公司说假话、做假账成风,必将破坏资本市场运行规则,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动摇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根基。

当前,我国正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健康活跃的资本市场发挥枢纽作用。同时,健康的资本

市场在增加资本供给的同时,还具有财富效应,在改善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增进人民福祉中应当发挥更大作用。唯有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让造假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更好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信心,进而提振资本市场。

要合力铲除造假土壤。随着监管执法力度的加大,财务造假隐蔽性、复杂性、系统性日益增强,仅靠证券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难以有效应对,还需各方攥紧拳头合力出击。一方面,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通银行、海关、社保、税收等行业数据壁垒,加强信息联动,减少监管盲区;另一方面,要构建综合惩防体系,推动财税、监管、金融、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等多部门多层次协同联动、齐抓共管,让造假者寸步难行。

重拳震慑从根本上杜绝造假。此次专项行动不仅是要打击过往违法行为,更给未来潜在的造假行为敲响警钟。上市公司切勿再抱有侥幸心理,视造假为儿戏、视监管为无物,否则,最终

伤害的还是企业自身。上市公司要提高认识,深刻意识到诚信经营、真实信披是必须尽到的责任。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建设,约束好“关键少数”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源头上防范、杜绝做假账。

上市公司因造假被罚,势必会影响公司业绩和股价表现,中小投资者难免受到波及,容易造成企业违规投资者买单的局面。惩戒财务造假还须重视投资者保护,要不断完善“民行刑”有机衔接的立体式追责体系,更大力度落实投资者赔偿救济,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赔偿效率,让造假者把该承担的责任全都担起来,织牢织密投资者保护网。

对财务造假的打击越严厉,保护投资者的屏障就越坚实,资本市场就越规范有序。可以预期,随着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的加快形成,造假的利益链条将越来越难以维系,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将更加顺畅有效,一个干干净净、风清气正的资本市场生态有望加速形成。



11月26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国家湿地公园风景秀美。近年来,当地加大湖泊湿地修复力度,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目前,银川市共有5个国家级湿地公园、近200个自然湖泊,湿地总面积5.31万公顷。 袁宏彦摄(中经视觉)

对话经济学家

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对话刘尚希

财税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先行军、突破口

主持人:财税体制改革是您长期以来研究的领域。很多人认为这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进行的一次最重大的财税体制改革,您怎么看?

刘尚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是财税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全会提出一个重要论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新的认识、新的定义和新的定位,强调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认识财政、理解财政,是一个重大变化。此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在前面改革成效基础上推进的。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三大块内容:第一是财政体制改革,现在也叫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第二是预算制度改革,第三是税收制度改革。这三块内容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三者不是简单

的并列关系,而是在一个有机整体中有着不同定位、主次之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政体制是主体,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是两翼。“一体两翼”形象地描述了财税体制改革三块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时,应按照“一体两翼”的思路。作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会牵引预算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同时,三块不能各管各的,更不能分开来看。如果分开推进,就会出现碎片化的情况,整个财税体制系统性优化也可能会打折扣,这是从过去改革中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整体布局、分步实施、协同推进。

主持人: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对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把握?

刘尚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基础没有夯实,就难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历史经验看,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是改革的先行军、突破口。好多改革往往需要财税改革先行,同时不少改革又需要财税去支付改革成本。所以,财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是改革的重点,甚至是改革重点的重点。

主持人:包括更好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都非常需要财税体制改革的支持。

刘尚希:财政是社会的血液,与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细胞、局部都紧密关联。企业、家庭、个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区域,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的细胞、局部,与财政都有紧密关联,通过税费、财政支出等方式联系起来。例如,教科文卫体各个方面,支持科技创新、鼓励企业研发、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等,都与财政一收一支过程连接在一起。

提高中央本级支出比例是改革的重要目标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财税体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决定》对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作出部署,强调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为什么特别强调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刘尚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

革,牵涉到当前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债务、宏观调控、土地财政转型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离不开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约为86%。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会影响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不顺,就可能妨碍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当中,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

主持人: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应当如何调整,才会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需求?

刘尚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核心的问题涉及事权、财权、财力的分配。从操作层面看,涉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划分,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刚才提到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约为86%,这

意味着中央本级支出只占14%。从我们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个比重在不断调整变化,地方占比越来越高,中央占比越来越低。

从全球来看,我们梳理了一些主要经济体,中央收入以及中央支出占比大都不低于50%。这个比例不仅与各国的治理结构、政治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发展阶段相关。

一般来说发展水平越高,中央支出的比例就会越高。这是因为发展的整体性越来越强。欠发达时,可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各个地方各自发展,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充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有辖区之间外溢的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人口增加,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仅靠基层政府无法解决。比如,农民工进城后同等享受待遇、老人养老、小孩上学,这些成本需要由当地政府承担。这其中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如果统筹层次低,问题就很难解决,就会妨碍人口流动和家庭迁徙。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不到50%,与此有直接关系。

在城镇化推进、人口流动过程中,实现人口聚集与产业聚集相匹配,需要有一些事权上移到中央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自然就会提高。这是与发展阶段相关的,发展程度越高,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就需要越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下转第三版)



请扫码